

疫情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认识

刘亭



疫情对区域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探讨相应的战略演进和应对之策很有意义

最近，在网络上参加了一场中国区域经济 50 人论坛的专题研讨会。既然是区域经济研讨，还是就疫情对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一个粗浅的分析，具体可用“三个更为”加以概括。

多层面的区域分化趋势将更为明显

4 月 17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概括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全国一季度经济负增长 6.8% 的实绩，也无可置疑地验证了人们的主观感受。虽然分省区市的具体数据还未揭晓，但可以想见，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大区域中的各省区市以及省区市的各市县区之间，区域分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经全国实施包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上述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加快，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增长速度相对放慢，但近年来这种发展趋势有所逆转，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又开始相对加快，地区分化日见显性化。

历史上，区域经济发展的“东西现象”，正在被“南北现象”所取代，这非常值得关注。这里既有区位优势条件、资源禀赋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体制变迁的差异所致。市场化改革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区域，对可流动的诸如资金、科技、人才等资源要素的吸引力会更强，处于区域发展角力场中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

城市群和都市圈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更为突出

疫情对人口和经济高度密集的大城市冲击力巨大，譬如本次疫情中惨遭“封城”城市武汉。因此，很多人严重质疑大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强调乡野村落对于阻击疫情扩散的种种好处。对此，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机器大工业时代的高密度城市，固然有人口密集、空间逼仄、交通拥堵、空气污浊等“城市病”，但其无可比拟的规模集聚效应，作为客观经济规律，还是会向乡村不停地抽取土地和人口资源。当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对于资源过度密集的消极后果，自然会有反思和改变。如何在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谋得一个最佳的平衡，人们找到了城市群和都市圈这样的新型城市化的“主体形态”。

城市群和都市圈，既不是“摊大饼”摊出一身毛病的点状大城市，又不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片田园乡村，而是“葡萄串式”空间布局，由大中小城市、特色小镇和郊区村落共同组成的一个网状空间。其中既有城市人口、二三产业的集聚，又有郊区镇村都市农业、民宿农居、生态绿化的舒朗，是一个用更大空间尺度计量的城镇村集群。

这个集群，因为既有中心城区的强大聚合，又有“满天星”般镇村的拱卫，其间基于高密度和高速率交通通信形成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使之发育成为一个有机的城市综合体。这里，既有城市发达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又有适度隔离的田园风貌和绿色景观，因而是一个协调、和谐的城市共同体，同时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出了对整个区域经济核心引擎的辐射带动和战略支撑作用。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更为关键

有人说，此次疫情是对各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次大考，言之有理！排除资源禀赋的明显落差，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的好坏只不过是区域治理能力的必然结果。

善于调动本地市场主体积极性、创造性，且将经济、社会治理得有条不紊，形成特色文化积淀的区域，往往可以凝聚较为旺盛的人气，运行的综合效能也比较高，且不易因领导干部的变动而频繁发生大的波折。这些地方起初往往不是最先发的，但顺势而为把机遇抓住了，又能慎终如始“，一张蓝图绘到底”，结果假以时日，就慢慢地后来居上了。如果再能谦虚谨慎、与时俱进，那就可能保持一个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

区域治理是个很大的概念，但其中最关键的当属治理体制的先进性。如果一地的社会治理体制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做到正确的集中，使当地呈现出一个既有法治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那就是一个好的体制。如果一地的经济治理体制，能够在搞活的基础上做到有序监管，使当地呈现出一个资源配置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政府更好发挥导向护航作用的发展局面，那也就是一个好的体制。

当然，这种治理体制“天上掉不下来，地里长不出来”。好的治理体制是从实际出发，经由对不合时宜的传统治理体制改革创新而来的。就应对这次疫情中的情况来看，数字经济发育比较充分和领先的区域，在疫情对经济造成普遍冲击的情况下，体现出更强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韧性。而市场化改革较为坚定和彻底的区域，往往体现出相对较高的包括经济、社会和政府等在内的综合治理能力，因而在疫情冲击下也展现出相对更好一些的发展态势。